

【新闻学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报“新女性”话语的革命化与时代化——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为中心的考察

朱清河 袁映雪

【摘要】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封建妇女观念复燃，妇女运动停滞不前，妇女群体陷入社会身份的困惑之中。在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的共同指导与引领下，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将女性责任、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命运和历史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形塑出多元化的“革命新女性”话语体系，使自身日益成长为指导国统区妇女运动、抗战舆论动员的重要组织力量，指引着妇女从依附性的客体走向社会主体，以参政者、工农劳动者、革命战士等新的社会角色，斗志昂扬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之中，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厥功至伟的贡献。

【关键词】《新华日报》；全面抗战；新女性；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朱清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二级伟长学者，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宣传教育基地主任（上海 200072）；袁映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1]。

1938年，《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后移渝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日报，被国统区群众誉为“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1940年5月，正值全面抗战相持阶段，其副刊《妇女之路》问世。该刊由中共南方局负责编辑出版，编委包括张晓梅、吴全衡、徐克立等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等为常驻撰稿人。该刊以反映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研究和讨论妇女解放理论为宗旨，记述妇女抗战事迹、工作和生活等内容，服务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启示着妇女们转向符合社会形势的“新女性”，以期逐渐从妇女解放的自由宣传走向动员组织作用^[2]。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女性被视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中心感应区，女性社会形象和社会角色的嬗变是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解放。^[3]为了巩固和扩大妇女统一战线，中共将国统区妇女运动问题明确融入民族主义语境，集结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力量，试图通过《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将妇女文化身份与抗战动员相结合，来解构传统女性的社会认同，构建新女性的身份认同，从而“推动民族的社群，更能感受到共同的认同”^[4]。福柯将话语视为一种实践活动，话语生产会按照一定的秩序而被选择、组织和再传播。^[5]话语实践能够建构社会主体的身份，而社

会主体又会反过来重构社会的话语实践。^[6]新闻话语是主观、客观辩证过程中产生的部分社会真实，能够带来社会主体身份的认同，反映出社会脉搏的跳动。本文试图回归全面抗战的历史语境，透过报刊公共论域，探究女性解放的具体观念及话语意涵如何？中共党媒设置哪些话语规则来建构社会真实、影响女性身份的塑造的？或者说，新女性议题在抗战公共话语领域是如何被中共“言说”的？

二、现代报刊与“新女性”议题的公共化

（一）报刊媒体与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被译为“文化认同”，与“个人身份”相比，更强调族群的集体认同，特指人们的主体经验带有民族国家的文化本质特征。^[7]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身份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不断变动的特征，其建构是不断进行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断裂和危机。^[8]对于全面抗战时期的女性而言，她们需要结合全面抗战的家国语境，开展新的社会实践，解构传统女性身份，建构出新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

媒体作为思想观念物质化的传递装置和中介，能够形成“意义的移动”，串联起不同的话语文本、社会事件以及社会实践^[9]，形塑思想观念的形态。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话语”不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还能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反映社会运动的变迁与结构。^[10]

在20世纪早中期，由于报刊发行和知识层次的限制，直接受到妇女报刊影响的主要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群体，这些进步女性会进行“二级传播”，建立起一套“上行下效”的说服传播模式，从而影响女性群体的身份建构和价值引导。^[11]《女学报》《妇女时报》等民间报刊，传播了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独立新女性身份的建构。而中共主管的妇女刊物《新华日报·妇女之路》《现代妇女》等，传达了党对妇女运动的指示，将妇女本身的问题明确置于抗日救亡的民族民主革命当中，积极进行妇女抗日救国宣传，构建女性的社会化革命身份，发挥着指导妇女革命的作用。

（二）从“女国民”到“新女性”：女性文化身份的转变

自抗日战争开始，抗日救亡讨论成为主流，报刊营造出了一种建构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女性解放议题俨然是其中重要一环。^[12]20世纪初，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民间进步人士发起了五四运动，开启了女性革命的星星之火，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跻身报刊活动，向精英女性群体传播妇女独立的新思想，提出“欲新中国必新女子”“建设国民之母”的设想，寻求“独立人格的女国民”的身份转型。与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旧女性”相对应，“新女性”“新妇女”应运而生，被视为集权利、义务、素质为一体的革命女性代名词，频现于公共舆论场域当中。

在全面抗战前期，国共关系扑朔迷离，妇女界尚未广泛团结起来。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既动员国统区妇女爱国参政，但又极力将妇女镇压解放纳入一党专政的既定轨道中。1934年2月，蒋介石在国统区发起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妇女新生活运动作为推行家庭改造的重点之一同时开展，对女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服务技能进行规训。1938年5月，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纲领》，希望妇女无偿支援前线，“恪尽妇女天职”，却未提及妇女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国民党主管的《中央日报·妇女新运周刊》《北平晨报·妇女与家庭》等刊物，都开始宣传妇女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试图建构出生活朴素节俭、热心改良家庭，为国民政府之所需尽心力的“新女性国民”。同时，国民政府限用女性职员，发出“男子在社会上服务，女子在家庭中服务”^[13]“先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14]的限制性论调，使得“新贤妻良母”的沉渣复燃，国统区妇女解放运动陷入低潮。

与之不同，中共中央采取“党团联合”的共同纲领政策，改造非党女性团体的组织成分，发展、动员基层女性群众，鼓励女性的民主自由觉醒，自主投身于抗日洪流。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妇女工作大纲》，将“新女性”的改造融通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动员工作中，为寻找抗战道路的各界妇女指明方向。具体包括，在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女性在政

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平等，破除封建旧枷锁；将中共抗日纲领与在地化实践相联系，强化抗战与妇女解放的精神教育；建立妇女党团组织等。^[15] 1938年5月，宋美龄、邓颖超、孟宋树、李德全等各界知名妇女人士召开庐山妇女谈话会。在会期间，基本达成妇女统一战线共识，形成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结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即《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工作大纲》。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更充分的方式，将妇女解放与抗日宣传推向高潮。

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对立形势，这一时期国统区妇女的社会生产事业寥若晨星，妇女解放出现全面逆转，国统区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陷入自发分散的谷底。“许多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农村妇女、学生妇女、工厂妇女等都没有组织、没有统一，各方面的妇女团体多得很，然而有群众的倒是非常的少。”^[16] 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采取党团组织领导妇女运动的模式，严格管控国统区妇女运动的舆论，发起“妇女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妇女方针，使得“男子中心论”“妇女回家”的论调再度泛起，“家庭即是社会，家庭的生活即是社会的生活，家庭的服务即是社会的服务”^[17]。

为了帮助广大妇女增强团结、深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妇女统战路线的锐利武器，持续重视“新女性”的身份转型问题，批驳“妇女回家”的陈旧思潮，鼓励国统区妇女展开民主宪政运动。报刊素有“民众之喉舌”之功用，《新华日报·妇女之路》通过报刊文本进行社会意义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书写，为革命新女性发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宣传妇女解放、批驳错误思潮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民间进步人士通过《申报·妇女园地》《新民报·新妇女》《江西民报·妇女与家庭》《妇女生活》《现代妇女》等一批进步妇女刊物声援“新女性”，以民族解放“抗日胜利”为妇女解放之根本要素，强调妇女应当坚决地负荷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责任，积极发表论战。面对国民政府发动的破坏团结、削弱抗战力量的反共行径，在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指导下，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为代表的中共党报，积极宣传和组织妇女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将“新女性”议题公开化、影响扩大化，特别是将民主自由、经济独立等现

代女性的概念与“女战士”“女同志”等政治革命色彩相连，转化为能够“走出家门，抗战建国”，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革命者，为国统区妇女提供了新的社会身份示范。对此，我们可以结合历史语境，对《妇女之路》进行文本解读，了解当时女性的自身意识、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从而分析女性文化身份的转变。

三、以报动员：抗战建国宣传与“新女性”的话语建构

国统区妇女统战宣传与革命新女性议题的公开化，从《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妇声》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主办的妇女刊物展开。在政治动员的主体框架下，中共知识分子们在中共长江局妇委的组织下，在《妇女之路》副刊上广泛宣传妇女联合抗日的重要性。随着宣传与动员的深入，党报中关于女性议题的呈现方式和主题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女性议题与“抗战建国”“妇女解放”的时代命题密切相连，“革命新女性”的社会身份更加多元化，影响着全面抗战时期妇女解放的价值导向和身份建构。

（一）推进妇女统战与妇女解放的深入性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下设妇女委员会，作为国统区妇女界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专门从事国统区的妇女统战工作。《妇女之路》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舆论宣传阵地，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导，围绕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为指导思想。为配合妇女党团的组织宣传，刊登了大量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邓颖超、张晓梅、卢竞如等南方局妇委妇女组成员以及潘梓年、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诗歌、小说、社论等多种体裁作品，为国统区妇女提供女性解放的新指示、新经验与新知识，阐明国统区女性的真实境遇与利益诉求，致力于打通一条“新女性”的彻底解放之路。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放弃了“民族主义抗战”的民众动员之根本，国统区出现了“新贤妻良母”“妇女回家”的复古论断，掀起了妇女社会身份的纷争。在此背景下，1940年8月，中央南方局妇委负责人邓颖超注意到了这些错误

思潮，在《妇女之路》上发文《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淡的批判》，提出要坚持反对“新”的贤妻良母主义，批驳妇女解放与抗日革命相分离的错误观念。“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既和中国民族解放的任务息息相连的”^[18]，鼓励妇女牺牲“小我”，走出家庭投身于抗日战争当中，从而寻求彻底的妇女解放。这也传达了党的正确思想，为妇女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妇女自身的觉醒。

1941年1月，在全国妇运干部会议上，国民党加强了对妇女运动的控制，将全国妇运指导方针改为三民主义，迫令将妇女统战运动转为国民党专制，并加紧迫害进步妇女团体和干部，使得进步妇女刊物《妇女之路》一度被迫停刊，中共领导下的妇女救亡运动一度陷入低迷。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之际，《新华日报》承担起公开宣传指导妇女运动的任务。针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邓颖超在《三·八节献词》指出，目前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应该着重于政治层面，教育、动员妇女适应目前的抗战需要，号召妇女为着中华民族和妇女解放，坚持抗战到底^[19]。1942年，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国际背景下，中共中央明确策略，将“通过各种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和妇女报刊，在知识妇女和部分劳动妇女中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主义教育，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亲密和团结”^[20]，坚定了国统区妇女抗战到底的信念，提供了妇女统一战线抗日救亡的合作指导。

在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妇女界被压抑的进步力量再度崛起。《妇女之路》刊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文章，如《中国妇女努力的方向——纪念十月革命节》《妇女界要求实现民主》等社论，鼓励妇女追求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男女平权，指明妇女民族解放运动需要深入地、彻底地推进，背后必须有先进的民主制度作为保证，“妇女的解放运动，首先需要争取妇女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改善”“向整个社会争，向某种制度争”^[21]。

（二）塑造革命新女性：妇女抗日救国与女性权利的“合理化”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都被放置在家庭生活的场域，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养成了自卑、依赖、盲从的特点。^[22]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

的《妇女工作大纲》的政治指示之下，妇女作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以下层统一战线女工、农妇、城市贫苦妇女及学生为依靠”。^[23]《妇女之路》为了唤醒了广大妇女阶层，发布多篇文章，将女性置于公共场域之中，动员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激发女性迈向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有机结合。

1. 唤醒女性主体解放与社会责任意识，鼓励妇女参政议政

在国统区，国民政府为了压制民主革命运动，强力推行专制独裁的统治政策。为了动员广大国统区群众有组织地开展妇女运动，《妇女之路》犀利地揭露了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下，国统区妇女全体政治权利的严重缺失，过着被任意打骂杀害的农奴生活。^[24]国统区人民没有人身自由，失去了一切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权利保障，昆明、上海、重庆等地的进步报刊甚至相继被国民政府查封。

在妇女解放正值低潮之际，《妇女之路》作为“国统区的一盏明灯”，将宪政运动与妇女运动结合起来，向妇女宣传民主政治，积极唤醒女性主体的解放意识。^[25]中共妇女报刊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深刻分析当前局势，认为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危险关头，针对在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出现的投降妥协主义，绝对不能退让投降，鼓励、动员国统区的妇女与解放区的妇女齐头并进，参与民族民主革命^[26]，告诫妇女大众要将妇女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改造和进步事业相结合，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以此获得妇女群体真正的解放。

为了使国统区妇女树立坚持解放的信心，《妇女之路》对国内外妇女参政议政的经验进行大量介绍和宣传。一方面，该副刊多次发文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妇女们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介绍各抗日根据地女区长、女村长、女代表的工作以及根据地广大妇女参选的活动，向国统区妇女展示了民主政权下妇女参政议政的光明之路。^[27]另一方面，《妇女之路》注重引导妇女宪政运动的健康发展，学习和借鉴了世界范围内较为成熟的妇女解放的经验，明确女性群体要争取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论证社会变革下男女平权之重要性。^[28]

2. 抗议劳动女工的不公遭遇，声援“职业妇女”身份的合理化

20世纪40年代，不少妇女为争取经济独立，

开始参加公共生产劳动，谋求经济权利。在国统区，国民党政府的封建性和保守性，导致不少单位禁用、歧视、裁撤女职工，“妇女回家”的陈旧论调随之死灰复燃。

面对国统区妇女解放的桎梏，中共不仅通过《新华日报》态度强硬地揭露国民党的封建腐朽政治，抨击国民党女工政策，披露国统区女工的痛苦遭遇，建构出“张大婶”“老朱”等被压迫的工农妇女形象。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团结与动员组织广大下层妇女为中心，将女工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正确的女工方针政策，鼓励女性学习职业技能，投入社会寻求职业。邓颖超、卢瑾等妇女意见领袖为女工“立言”歌颂：“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到底，粉碎敌人的经济进攻，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29]“她们以全部的劳动力支持生产，建设国防工业，产生新的物质力量”。^[30]该报也正视目前职业女性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发布了《略谈职业妇女的修养》《职业妇女应该怎样学习》等文章，鼓励开展女工夜校、女工识字组、托儿所等具体实践。解答、讨论工作权益、家庭育儿、婚姻自由等与妇女利益相关的问题。这不仅助力扫除妇女的知识盲区，提高妇女文化素养和自我意识，而且也能够为职业女性排忧解难。

在此基础上，《妇女生活》针对这一妇女歧视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声援职业妇女，推动社会舆论热议，争取社会的帮助。《妇女之路》为“劳动妇女”“职业妇女”立言论，批驳妇女回家的不良论调，刊载国统区工农女性的不公遭遇，维护职业妇女的工作权利，刊发《结婚即失业》《女职员薪水打八折》等文章，公开批驳了国统区女工所遭受的严重就业歧视和工资待遇问题，以此捍卫“职业女性”的工作权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边区女工则过着平等、优待的劳动生活，“这里没有黑心眼的资本家，女工的工资与男工一样……女工进去比别人还优待，宽容些”^[31]，显现出了中共的民主性和先进性。

3. 构建新楷模：革命女战士与行业模范女性

面对抗日救亡的中华民族困境以及国民政府的社会动员假象，中共以《新华日报》为平台喉舌，正在试图采用各类文字符号，赋予抗日动员文本超出其最初的政治符号意义，建构出“英勇无畏”“投身抗战”“自强自立”“贡献社会”等新

女性典型人物。

《妇女之路》集中报道力量，塑造出“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女战士群体形象。该刊大量记述普通妇女参与战斗的英勇事迹，特别关注解放区的女自卫军群体，发布了如《繁昌战斗中的妇女们》《妹妹参加游击队》等文章，展现了革命女战士群体不仅能够承担起拥军支前劳动的任务，而且能够完成保护群众、维持治安的参战重任。该报在《中国解放区妇运情况报导》中记述了边区女自卫军被俘后的英勇顽强，“像钢铁一样坚韧，丝毫刚强气质”^[32]。1940年4月26日，抗日女英雄李林率骑兵营吸引日军主力，掩护大部队转移时光荣负伤。《妇女之路》先后刊登了《李林同志略历》《一位民族女英雄——记殉国的雁北游击女战士》《时代的女儿——记李林》等系列文章，有的是长篇通讯，有的是回忆散文，这些文章先后跨度三年之久，全方位立体地介绍了抗日女英雄的成长史、战斗史，使得这位“民族的骄傲，华侨的骄傲，妇女的骄傲”，成为激励广大妇女抗战的鲜活教材。

该报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追求经济独立，为了发挥各行各业妇女模范的榜样作用，相继刊出边区劳动模范《马杏儿》《晋西北三个劳动女英雄——张秋林、刘能林、白全英》《边区妇女劳动英雄群像》《劳动女英雄》等通讯，着重介绍了解放区妇女生产劳动的劳动成效，塑造了一批积极向上、自立自强的劳动模范女性形象。该报刊登《学习蔡特金同志》《关于蔡特金》《永不能忘的会晤——纪念伟大的蔡特金》《卢森堡的生平及其事业》等文章，重点介绍了国外妇女运动的先驱领袖、无产阶级妇女革命家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等人为革命终生奋斗的事迹，扩宽中国妇女的视野，号召中国妇女学习外国妇女领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大战，致力于全民族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先驱精神。

四、结语

在全面抗战时期，女性的身份转型之路也充满着艰难与曲折。一方面，在外强内患的破局革命之下，妇女解放处于中华民族自救的重要环节得以重视。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与自由思潮处于激烈交锋，女性需要革新思想、革命角色以适应

社会的发展。

在向变而生的民族革命时期，中共肩负着“醒民救国”的政治使命，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通过历时性文本书写，促进“新女性”话语走向革命化与时代化取向，逐渐成为被认可的社会公共议题。该报将女性个体发展和民族命运、国家兴亡、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彰显出抗日救国、解放女性、保护女性权利等多层面的积极面向，使“新”的内涵渗透到了更广大、深远的社会影响层面。

正如著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是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所言，“虽然再现者（the representer）再现了被再现者（the represented），但再现的内容与方式却揭露、再现了再现者”^[33]一方面，该报将政治革命融入妇女运动，与国统区专制腐朽的封建妇

女观作斗争，解除妇女的思想困惑，助推妇女角色认同转型成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该报成为指导国统区妇女运动、舆论动员的重要组织力量，其所发出的“厚媒介之力”，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民族家国情怀，兼具有媒介动员性质的现象级呼唤。在中共指导下，该报参与、引导了社会公众对革命新女性议题的公共言说，赋予了“革命新女性”以“显性”效果，重构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特别是促进全社会对女性社会主体的尊重，鼓励女性社会责任意识觉醒并投入到抗日战争以及妇女解放之革命斗争中来。在经历了大量的信息建构后，沉淀为中共报刊对“抗日建国”“独立自主”等新女性主体身份的社会价值判断和期待^[34]，成为中国妇女从“旧”到“新”的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推力之一。

（责任编辑：余跃洪）

注释：

①《新华日报·妇女之路》（1940年5月16日—1947年2月16日），为每两周出版一期，刊于第四版，共发行149期，约600篇

文章，近90万字。1949年2月，该副刊在《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砸、驱赶背景下被迫停刊。

参考文献：

- [1]《写在刊首》，《新华日报》，1940年5月16日。
- [2]邓颖超：《目前局势与妇女工作》，《新华日报》，1940年5月16日。
- [3]杨晶：《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 [4]（美）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6页。
- [5]曾庆香：《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1页。
-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9页。
- [7]Kathryn Woodwar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 1997, pp301.
- [8]（加）张裕和：《文化身份的重构问题》，《跨文化对话》，2003年第12期，第141页。
- [9]（英）诺曼·费尔克劳：《话语分析：社会科学的文本分析方法》，赵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8页。
- [10]周裕琼、齐发鹏：《策略性框架与框架化机制：乌坎事件中抗争性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8期，第46页。
- [11]张丽萍：《报刊与文化身份：1898—1981中国妇女报刊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 [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妇女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79页。
- [13]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编：《妇女职业问题讨论集》，1941年，第10页。
- [14]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黯淡》，《大公报》（重庆），1940年7月6日。
- [15]丁卫平：《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 [16]张晓梅：《以战斗和团结来纪念三八》，《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
- [17]朱家骅：《如何做妇女运动》，《妇女月刊》，1941年第2期，第3—6页。
- [18]邓颖超：《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淡的批判》，《新华日报》，1940年8月12日。
- [19]《三·八节献词》，《新华日报》，1942年3月8日。
- [20]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新华日报》，

1942年3月8日.

[21] 于茂林:《妇女运动中心何在?》,《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22] 周积明、宋德金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8页.

[2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 妇女解放问题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24] 《全国妇女界意见的总结——为响应邓颖超同志的号召向国际妇女会议提出建议》,《新华日报》,1946年11月3日.

[25] 张晓梅:《以战斗和团结来纪念三八》,《新华日报》,1940年1月8日.

[26] 邓颖超:《今年妇运努力的方向》,《新华日报》,1943年1月3日.

[27] 袁勃:《解放中的晋察冀妇女》,《新华日报》,1940年12月3日.

[28] 列宁:《写给女工们》,《新华日报》,1940年8月22日.

[29] 方红姣、周锦涛:《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与〈新华日报〉中的工农女性形象》,《求索》,2006年第8期,第211页.

[30] 卢瑾:《要求改善女工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5月30日.

[31] 《我在抗战中进步了》,《新华日报》,1940年10月4日.

[32] 《中国解放区妇运情况报导》,《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4日.

[33] (美)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是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页.

[34]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The Revolutionary and Epochal Discourse of “New Women” in the Newspap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 Study Centered on Xinhua Daily · Women’s Road

Zhu Qinghe, Yuan Yingxue

【Abstract】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feudal women’s concept in the nationalized areas was revived, the women’s movement stagnated, and women groups fell into the confusion of social identity. Under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hua Daily · Women’s Road, the party newspap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osely linked women’s issues with the topics of “Anti-Japanese War,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omen’s liberation”, shaped a diversified social identity of “revolutionary new women”, guided women from the dependent object to the social subject,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for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practice in the public sphere with new social role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volutionary soldiers,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newspaper integrated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nto the women’s movement, closely combined women’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fought against the feudal concept of women,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rce guiding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public opinion mobiliza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Kuomintu-controlled areas.

【Keywords】Xinhua Daily, New women, Anti-Japanese War